

位于青海南部海拔4000米以上青藏高原腹地的三江源自然保护区,地域辽阔,地形复杂,湿地生态系统星罗棋布,是长江、黄河、澜沧江的发源地,也是我国大江大河中下游地区和东南亚国家生态安全与区域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屏障。

在世界范围内,很难再找出这样一个汇聚了如此众多名山大川的地方,也很难再找出三条源头如此血脉相连的大河。然而,上世纪末,受人类活动加剧、超载放牧及气候变化等因素影响,这一地区的草原、湖泊、冰川等生态系统发生退化。为此,2005年,国务院批准《青海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和建设总体规划》,决定国家投资75亿元人民币建设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十余年来,国家已累计投入生态资金近90亿元,使三江源地区的生态退化趋势得到初步遏制,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举世瞩目,20世纪末还鲜为人知的三江源,如今已成为21世纪保护自然生态和区域协调发展的热点地区。今年4月13日,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工作正式进入具体实施阶段。

三江源只是中国生态保护和建设成就的缩影。自1956年建立第一处自然保护区以来,我国已基本形成类型比较齐全、布局基本合理、功能相对完善的自然保护区体系。截至目前,全国已建立2740处自然保护区,总面积147万平方公里。

2016年,中国自然保护区事业已开创60年,在迎来蓬勃发展新时代的此时,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工作也加快了步伐。

中国“国家公园”亮相

国家公园的概念源自美国,1872年美国建立起了世界上第一座国家公园——黄石国家公园。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国家公园已经成

重构自然保护区体系(上)

◆ 鄂瑶

中国自然保护区事业开创60年来,成就举世瞩目,但同时也存在着各类自然保护区空间重叠交错、保护对象重复、保护目标混乱等问题,在国家层面提出“建立国家公园体制”之后,一场自然保护区体系的“重构”与“变局”正在加紧进行。



■ 位于青海南部海拔4000米以上青藏高原腹地的三江源自然保护区,湿地生态系统星罗棋布,自2005年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以来,生态保护成就举世瞩目,如今,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工作正蓬勃开展

为一项具有世界性和全人类性的自然文化保护运动,并形成了一系列逐步推进的保护思想和保护模式。目前全世界已有上百个国家设立了多达1200多座风情各异、规模不等的国家公园。

在中国,国家公园体制的建立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推进之中。

“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是在三年前召开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首次提出的。

去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第十二条明确指出,“加强对国家公园试点的指导,在试点基础上研究制定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构建保护珍稀野生动植物的长效机制。”

此前,在2015年1月,北京、吉林、黑龙江、浙江、福建、湖北、湖南、云南、青海被选作开展建立国家公园体制的试点省份。根据国家发改委会同中央编办、财政部、国土部、环保部、住建部、水利部、农业部、林

业局、旅游局、文物局、海洋局、法制办等13部门联合印发的《建立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案》,每个试点省份可选取1个区域开展试点,试点时间为3年,2017年年底结束。

“九省份试点”的启动,无疑是从2013年年底中央正式提出建立国家公园体制后所跨出的重要一步。

不过,接下来的工作却并不轻松。

据知情人士介绍,为加强对试点工作的组织领导,建立工作协调机制,一个由国家发改委牵头的建立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工作领导小组专门成立,国家发改委副主任王曉海担任组长。领导小组多次召开领导小组会议和联络员会议,研究试点有关问题;多次召开座谈会,指导试点地区开展工作;此外,领导小组还赴多个试点地区进行了多次实地调研督导。

同时,发改委还启动了总体方案研究,在国家公园标准规范、现有保护地体系梳理、构建相适应的管理体制等方面开展重点课题研究,

全面总结美国、南非、新西兰、巴西、德国、泰国、日本等国在国家公园体制建设与管理方面的实践经验。

为了更好地借鉴国际经验,力求确保中国国家公园体制既符合中国国情,又与国际接轨,确保国家公园体制建设从具体试点到顶层设计都科学合理,有章可循,国家发改委还与国外相关机构签署了多个合作协议。

尽管建立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工作备受重视,但各地试点实施方案的形成过程却并不“一帆风顺”。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工作开展一年多来,在相关部门和试点省的共同努力下,共有5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试点实施方案获得批复,分别是:青海三江源、湖北神农架、福建武夷山、浙江钱江源、湖南南山。

探路先锋的激情与困惑

今年5月14日,国家发改委批复《神农架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试点实施方案》,标志着全国唯一以“林区”命名的行政区——神农架林区

将正式启动国家公园体制试点。

湖北将神农架作为该省唯一的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地区,在湖北国家公园研究中心主任邓毅看来,这是因为神农架具有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和良好的保护基础,而且满足代表性、典型性和可操作性等试点区域的选择要求。

虽然自身有着较好的条件,又符合试点区域的要求,但在从跻身全国首批9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到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正式启动的这一年多时间里,围绕《神农架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试点实施方案》的编制工作,相关工作人员还是付出了极大的努力。

“神农架林区人民政府各部门展开了多方调研并形成了初稿,在此基础上又经过反复论证修改。”邓毅告诉记者,调研和论证主要围绕四个方面进行:一是试点范围是否选择神农架全域,原有保护地体系如何整合;二是采用什么样的单位管理体制,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如何处理;三是人员需求测算及安置配备方案;四是资金需求测算。“考虑到改革涉及多方利益的调整,最终的试点实施方案采取了较为稳妥的‘三步走’方案,一年打牢基础、两年完成试点、远期全域推进。”

尽管大家都花费了不少心思,但邓毅仍然觉得,这样的试点实施方案并非十全十美,因为“还有许多深层次的矛盾尚待解决”。他举例说,比如如何处理保护与利用的关系,这在国家公园范围的划分、小水电和矿山的关停等问题上都有所表现;再比如说,国家公园管理局与地方政府间的事权划分尚有不清晰的地方,特别是与规划、保护相关的事务还有待厘清;还有,纵向政府间国家公园事权的划分也不是很清晰,这又会引起机构如何设立、职能如何确定等问题。

杂技好男儿程海宝

陆林森

38.走马上任

1996年,程海宝走马上任了。其时,上海马戏学校已经有8年校龄了。而就在程海宝担任校长一职前的1995年4月,上海市马戏学校的首届学生,经过7年学习,迎来了毕业典礼。这届学生,用以基本功训练的时间为两个学年,第三学年开始节目功训练,从1988年3月入学,到1992年,时间只不过4年,节目已经成型,先后出访日本、美国、印度尼西亚、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充分反映了上海杂技界的办学成果。他们毕业后,学校向上海杂技团输送了47名毕业生,杂技团有了一支享有专长的新生力量。程海宝感慨地说:“上海马戏学校成立之前,全国有上百个杂技团,但就是没有一所正规的杂技学校,培养杂技演员采用传统的团带班方式,而团带班是没有毕业证书的。学校的成立,得益于改革开放。因为改革开放使上海经济、文化等取得了突飞猛进的成就,我们的学校这才应运而生。”“学校要求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由市教委统一颁发中等职业毕业证书。团带班不可能做到。我们学校有十多个文化老师,5个生活老师,24小时轮值。业务老师是专业的。”

程海宝爱将“马校”的学生说成“孩子”,反映了他的心态:爱学生,如同爱自己的孩子。实际上,“马校”的学生,有的连10岁都不到,最大的,也不过十来岁,他们怎么不是孩子呢?在程海宝看来,孩子们远离自己的父母,需要得到如同父母那样的呵护和爱,这是他和“马校”老师的责任。他说:“我从前任校长手里接过接力棒,没有理由不将学校建设好,没有理由不将孩子们培养成才。”深化教育改革,加强学科建设,完善硬件设施,提高师资素质,他坚持以传承中国杂技为己任,不断探索出人出戏的办学思路,经过十多年不懈努力,走出了一条富有个性化的杂技教育新路。

2003年,经上海市教委、上海教育评估院评审,上海马戏学校被认定为“上海市百所



誉称号。

在程海宝带领下,教师们心系中国杂坛,融教学和比赛于一炉,培养出了一批优秀学生,频频亮相于一些重要的赛场,国际国内一些顶级赛场上不断传来好消息。他们相继荣获的奖项有:第25届蒙特卡洛国际杂技比赛“金小丑”奖,第14届、16届、18届初登舞台国际杂技比赛“金K奖”“亲王奖”“摩纳哥城市奖”,第27届蒙特卡洛国际杂技比赛“银小丑奖”,第22届罗马金色马戏节“金奖”“共和国总统奖”,第五届、第六届全国杂技比赛“金狮奖”,第四届全国青少年杂技比赛“金狮奖”等。

在学校的荣誉长廊上,“马校”的历届毕业生荣获的国际国内金奖、银奖以及单项奖多达50多个,获奖教师80多人次,获奖学生170多人次,他们的演出活动遍及美国、日本、意大利、澳大利亚几十个国家和地区。

由于每个学员角色都有非常强的专业性,他们被招收进校后需要由专业老师带教,经过三四年艰辛的培养方能上台;但多数杂技演员一过20岁就要被陆续淘汰。为保证原创剧目的数量,杂技团只能招收新学员再培养。可是,杂技是一门挑战人体生理极限的“行为艺术”,入门既难,招生也不易。以前,杂技团只要发布招生信息,很多人就会带着孩子赶来,即使排队等候报考,也大多耐心十足,因为是冲着让孩子当杂技演员而来。20世纪70年代初,杂技团招收60个学员,一半男孩,一半女孩,全部是上海户籍,生源有保障,尽可从应考生中挑拣。国家实施独生子女政策后,谁也不愿将孩子送去学杂技了,没有了可以“优中选优”的生源,杂技教育面临着“无米之炊”的尴尬。即使,有的家长愿意自家的“独生子女”去学杂技,也要看他们的身体条件符合不符合,对于杂技的特殊性和专业性,程海宝也很无奈地说:“并不是人人都可以学杂技的。学杂技除了要求不怕吃苦,还要看身体条件是不是符合要求,有的人身体条件不行,即使吃得起苦,也不行。”

5.机关算尽一场空

沈钧儒镇定回答:“全救会和它的名称一样,是全国各地的救国会的代表联合组成的,我们没有权力解散它;印刷品已经统统发出去了,没有留存的了。市长要逮捕我们吗?那应当依法由法院出拘票来拘捕。”

“市长邀请我们吃饭,把我们扣起来,这绝不是市长应该做的,传出去要闹笑话的。”

章乃器耸肩推手,做出一副嘲讽样。

邹韬奋笑着说:“市长先生,在今日国难当头之际,不嘲笑汉奸卖国贼,而嘲笑起民族英雄,这使我们感到吃惊。”章乃器紧跟着说:“市长是怕民族英雄太多了,民族英雄有什么罪过?”四人不由而同集中火力攻击吴铁城对待民族英雄的态度。

吴铁城颇为尴尬,不断拭着镜片,连说“失言”。这时,李公朴去同朋友李大超办私人交涉,责备他不该招人。“救国会的朋友一定会说我出卖沈老他们,我无法交代的。”李大超掩脸大声哭了起来。吴铁城看着一副哭哭啼啼的场面,自知无法收场,赶忙改口。“只要你们保证做到解散‘全救’,我就放了你们。”“这个,我们无法保证。我们只能保证自己不躲避,二不逃跑,恭候你的发落。”四人不约而同地回答。吴铁城无可奈何地挥挥手:“走吧!你们走吧。”

吴铁城一计不成,又生一计,找到浙江实业银行总经理李铭说:“你们的银行不应该容留章乃器这样的人,不去掉章乃器,对你们的银行十分不利。”李铭无奈,向章乃器转告了吴铁城的警告,好意地说:“看来救国会今后也不大可能再有什么活动了,因为政府已经决定取缔。你还是出国吧,银行出钱送你到英国去留学,这里的薪水照发给你家用。你到英国去学习三五年回来,那时不但银行需要你,国家也需要你。你好好地去向救国会的朋友们商量商量吧。”

章乃器凝望着一直关心自己的上司,心中一股感激之情在涌动。救国会需要自己,自己无法脱身,但是又不能连累了银行,自己由一个练习生成为今天的副经理,一切都是银行同仁的关照、提携,因自己拖垮了银行,简直太无情义了。沉思之后,章乃器爽快回答:

“那还是让我辞职吧。我不能让银行受累,也离不开救国会,那是关系国家存亡的大事。”

“太可惜,你是我们银行一手培养起来的金融人才啊!”李铭惋惜地说。

章乃器花了一个多小时办好辞职手续,头也不回地走出银行大门,离开了努力奋斗二十余年才获得的银行高级职位,继而辞去了与银行有连带关系的中国征信所的董事长一职。

吴铁城试图让章乃器丢掉金饭碗,迫使章乃器有所收敛,没想到章乃器竟辞职不干,换得一身轻,专心投身救国会活动中。章乃器的辞职引起了一场小小的波澜,社会上许多职员、工人声援章乃器,反对吴铁城的迫害。机关算尽一场空,南京政府奈何不了救国会领袖们。

救国会尚处在叙餐会阶段,共产党人周新民等人就参加了活动,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成立时,不少中共党员,如钱亦石、钱俊瑞、徐雪寒等参加了救国会工作,妇女界救国会发起时,秘密党员杜君慧就是十二个发起人之一。这些中共党员,都以秘密身份参加救国会。

当时上海的地下党组织,在国民党的破坏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政策下,遭到极大的损失,许多党员处在各自为战的环境中。救国会成立后,不少中共党员参加了救国会的工作,自觉执行中共的政策,借助救国会的影响开展工作。他们中的一些人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影响力,与救国会领导人有过交往,所以很快就接触到救国会的领导层,出谋划策,影响救国会的方针政策,使之朝着中共要求的方向发展。

在救国会内中共的秘密活动,分为以个人身份活动或代表中共组织参与救国会活动的两种情况。钱俊瑞不仅参与救国会的领导工作,同时也是中共在救国会中的负责人之一,直接与一部分中共党员联系或领导他们开展工作,如胡乔木、曹亮、钱亦石、王纪华、徐雪寒、石不烂等人都与他联系。在一些基层救国会组织中,也有中共的组织在活动,职教会中就有顾准、雍文涛、林枫组成的中共党小组,联系党员配合职教会的活动。但中共党组织形式十分简单,没有明确分工和具体的工作要求。

长河秋歌七君子

潘大明

